

关于目录学文化研究的思考

柯 平

目录学文化研究是从目录学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出发,探讨目录学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路向。文章认为:目录学不仅仅是研究文化的一种工具,更重要的是它通过揭示与报导文献信息的书目反映学术文化,其文献记录与开发具有文化积累和文化交流的意义。文化物化于文献这一特征,决定着目录学在文化结构中物质与制度层面传播、沟通的功能,实质是关于文献的文化现象。因此,现代目录学体系正在古典目录学的基础上随着文化的现代化而不断完善。

深层次的目录学研究是20世纪目录学发展的特征。近年来,目录学有了较大的转向,或者说目录学研究已进入第三期。本文将在材料积累、材料解释的基础上,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个角度进行深入探讨,把学科知识元素的组合引向学科体系的完善。目录学文化研究直接关系到对目录学的本质认识和发展认识,在学科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

文化的目录学观

探讨目录学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必须以文化的目录学观为出发点。20世纪关于文化的讨论及由此发展起来的文化学,经过历史的条理、哲学的思辨和心理的透视拓宽了文化研究的视野。而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界定真正把握了文化的内在特质,目录学就是与这一意义的文化发生着密切的联系。

目录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与文化发生了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证明:第一、书目和目录学为什么分别在殷商和先秦时期就产生了呢?过去归结为“人们利用文献的需要”。这是肤浅的认识。进一步分析人们利用文献的原因,实质是文化的需要。书目和目录学都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目录学的发展已经证明:语言文字——文献——书目——目录学的产生过程不是脱离文化背景而孤立存在的,没有文化的推动,就不可能有目录学的发展。第二、从目录学的目的看,由于书目渗透到各个文化领域,目录学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依附在史学之中,为学术研究提供史料,并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工具。许多学者正是运用目录学方法整理文献,通过书目一展文化史的长卷,形成我国文化导读的传统。被列入《中国文化名著精要辞典》的《书目答问》,岂止“令初学者易买易读,不致迷罔眩惑”,而是举荐经、史、子、集、丛图书,进行文化研究的目录学名著。20世纪初,研究国学促成开国学书目之风,以胡适的《一个

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和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书法》最为著名。当时的选书之争代表了学者们不同的文化思想,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有一定的影响。后来,著名文化史专家蔡尚思总结中国文化的历史经验,著《中国文化史要论(人物、图书)》,侧重学术文化史及其线索,强调“一个国家的学术文化,离不开历代的主要人物和主要图书,我们可以从此二者看出学术文化的基本内容”,并通过列举学科、撰写类序、列举人物、辨考学派、列举图书、提要钩铉,把人物、图书与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从目录学角度总结文化的典范。

以目录学为工具研究文化有三种方式:以时间为系列举人物及其名著,表现文化的历史发展与时代性;以空间为元集中民族或地区文献,展示文化的民族性与地域性;以专题为纲揭示图书及其思想,反映文化的分野与领域。然而,这些方式不过是打开文化研究宝库的钥匙和指南,或者说是透视文化的窗口。真正的目的是利用目录学所揭示的文献去总结文化的某些规律,将浩瀚的学术文献系统化,使博大的学术文化文献化,如同梁启超将广义的史学称作文献学^①。目录学研究书目,书目记录文献。因此,从目录学角度研究文化的落脚点是文献。14世纪的里查德·伯里所述关于傲慢的塔尔金的记载^②,无非要说明文献是人类的无价财富。哲学家波普所作的假设机器、工具毁坏或主观知识一起毁坏这两个思想实验,更好地说明了知识文献在文化进程中的价值。图书馆学家谢拉说:“没有交流就没有社会,没有一定形式的文字记载和保存文字记载的方式,便没有持续的文化”^③,其“社会认识论”把文化看作是一个社会知识和信仰的总和,由物质设备、学术成就和社会组织三个方面维持继续着。这就说明,一方面,文献是文化的结晶,没有一定程度的文化不可能有文献;另一方面,文化物化于文献,没有充分的文献就没有发达的文化。而目录学正是以这二者为前提,研究揭示报导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文献与社会特定需求之间的矛盾关系,在文化的目录学体系“文献——书目——需求者”中起着中介作用。

两种目录学的文化观

古典目录学和现代目录学与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相对应。显而易见,两种文化的差异导致两种目录学的区别。需要明确的是,是文化孕育了目录学?还是文化影响着目录学呢?这两种情况分别就产生和发展而言都是存在的。

传统文化是以封建社会文化为主体的观念形态,它不仅包含各种程式化了的理论形态,而且包括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心理特征、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等非理论形态。古典目录学在传统文化中与这两种形态都有联系。目录学的理论特征使之在本质上更接近于理论形态,或者说反映理论形态。而由于古典目录学研究离不开古代目录学家的思想,使目录学领域的活动间接反映了非理论化的形态。

古典目录学一千多年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什么?由于它与校雠学、版本学历史上的血缘关系,学科之间长期没有明确的界限。究其根本,文献是它们发生的源泉和共同的研究客体。从孔子整理六艺,为诗、书作序,到汉向、歆父子的校雠目录活动,同时产生了校雠学、目录学和版本学。后世所谓目录学校雠学之争重流而不溯源,因名而不求实。如果说校雠学包括目录、版本、校勘三部分,那么这里的校雠学其实就是古典文献学。校勘、版本成专门之学,分别研究文献的内在特征(语言文字)和外在特征(版本)。目录学则兼收校勘和版本成果,记录文献内容与形式,是“文献积累”的学问。

从传统文化看,书目不仅是文献的记录,而且是文化的记录。在我国学术文化史上有五部

书目最受推崇。《七略》，范文澜说它“综合了西周以来主要是战国的文化遗产，……是一部完整的巨著。它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④。《汉书艺文志》，金榜称之为“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日本学者金谷治称为“作为体系化的哲学著作”。《隋书经籍志》，顾颉刚说它是《隋书》中最有价值的一志。《四库全书总目》，梁启超说它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⑤。《书目答问》，被誉为读古书、治旧学的“摸门径”之作^⑥。这些书目的文化史价值首先在于它所积累的文献成为文化史料，书目在文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单是文献积累，而是文化积累。

官藏目录、私家书目和史志目录是古典目录学的三大流别。历代官私藏书目反映藏书之盛，与藏书楼共同体现着古代文化的变迁。在文献积累中，官藏目录求全，私家书目求精，相互补充，有益学术文化。特别是史志目录，因出自史家之手，附于史书之中，其地位最高，真正使目录学成为学术文化的组成部分，历代正史艺文志及补史艺文志就是一部完整的我国文化史长卷。

讲古典目录学的文化积累特别是书目的文化史价值都只能说是表层次的文化观，即文化的物质方面，具体表现为目录学中的文献。而深层次的文化观应该是文化的精神方面，指传统文化物质的——制度的——心理的三层面中后两个层面，目录学在这两个层面中有无根基？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国古代哲学。自汉代儒学独尊以后，儒家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哲学几成儒家奴婢，从此确立了目录学的儒家哲学基础。历代书目未有经书不列于首，从五经、九经到十三经，不过是经学的丰富与完善，儒家文化在古典目录学中的地位从不动摇。经学作目录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而目录学为治经工具并阐发经学要旨。从儒家学派校定六经、司马迁作《儒林列传》到向、歆父子通过目录学传播古文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汉代郑学的形成。王充《论衡》说“六略之录，万三千篇，虽不尽见，指趣可知”。在我国古典目录学文献中，关于学术文化不乏独到精辟的思想，艺文志中的“诸子出于王官论”就是古史研究的一大课题。所以，后人“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经愤之精术尽探，贤哲之睿思咸识，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⑦。

其次，在传统文化中，学术文化占有相当地位。虽然古代学者无不博通经史，但学术史未成专门。只有古典目录学以学术史为己任，体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精神。目录学的学术史思想主要表现于学术分类、叙录和类序之中。从六分法到四分法的演变，就是古代学术文化史纲，“类例既分，学术自明”（郑樵语）。叙录“用以考一人之源流，性质与列传相近”（姚名达语）。书目中总序、大小序叙一代一学一派之源流，“辨章学术之得失也”。“盖目录之学，莫难于叙录，而小序则尤难之难者，章学诚所谓‘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盖指此也”（刘纪泽语）。正因为此，自古目录书列于史部之中，目录学因兼学术之史而成为学中第一紧要事。张尔田说“目录之学，其重在周知一代之学术，及一家一书之宗趣，事乃与史相纬”^⑧。来新夏总结为“古典目录学领域，在长期进程中，由于有一大批著名学者的参与，曾编制了大量的各类型目录，使中国文化载籍得到比较系统的按类记录，增厚了中国文化的积累。并在长期实践工作中探讨了不同的分类体系，提出了有一定指导意义的理论。这不仅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宝库，也为世界文化史增添了光辉”^⑨。

现代文化是伴随着封建文化的衰落及西方文化的引入，在中西文化交融、新旧思想斗争中形成的。与此相适应，现代目录学也是在古典目录学与西洋目录学的矛盾冲突中产生的。现代目录学奠基者姚名达在新、旧两极分化之中，既没有抛弃古典目录学，而是作历史的总结；也没

有照搬西洋目录学,而是批评新目录学派效法西方之失。他将古典目录学与西洋目录学比较,认为中国古代目录学最大特点为重分类而轻编目,有解题而无引得。在此基础上提出现代目录学思想:提倡主题目录,反对十进分类;主张精撰解题,不赞成详列篇目;主张插架目录与寻书目录分开,前者依分类,后者依主题,使目录学成为人人所共知的最通俗的知识。这种思想与当时文化上保守与西化对抗联系起来,代表了进步的一面。

古典目录学在传统文化中重视文献积累,现代目录学在现代文化中则重视文献开发,通过揭示与报导文献信息,满足人们的信息与文献需求。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建立目录学的新体系;目录学更强调科学系统地揭示文献,充分有效地报导文献,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在信息化社会,科学研究需求成为现代目录学发展的动力,新方法、新技术的引进带来目录学领域的革命,现代目录学与情报学紧密配合,在科学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新文化孕育新目录学,新目录学需要新文化观。现代目录学继承和发展古典目录学优良传统,克服古典目录学的保守、封建思想,将目录学的重点从文献整理、为读书治学服务转向文献检索、为科研生产服务,使目录学从学术文化的目录学过渡到知识文献的目录学。

目录学发展的文化观

目录学的发展有内在的规律性和外在的条件,文化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文化发生学上有一源说和多源说。唯物主义文化观从社会发展的历史出发,证明文化具有民族性。从我国目录学与外国目录学的比较看,民族和地区的差异使目录学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中国目录学在“大一统”的文化影响下,阶段性不明显,缺乏创新精神。各时代的目录学都不脱离校讎,班固、郑樵、章学诚莫不推崇向、歆,重流略之学。而西方目录学在偏至、对立、明晰的文化中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如中世纪宗教文化形成基督教目录学时代。在中国目录学中,虽然儒学占统治地位,但目录学家并不排斥道、佛图书,书目中有道、佛另列,从魏《汉录》开始有专门释道目录。此后,佛经目录、道经目录与经学目录共同发展,这种状况是儒、道、佛文化长期发展的结果。

我国多民族的特点形成多民族的文化。而民族文化的复杂性在目录学上表现为处理民族文献的不同方法。汉文献、蒙古文献、满族文献及其目录学得到长足的发展。随着各民族文化思想的交融,民族文化渗透到文献和目录学中,这就为今天的地区或民族目录学积累了物质基础。如关于藏族目录学的研究是藏族文化和目录学相结合的产物。

无论是国家文化还是民族文化都不是孤立地发展,必然要与其它民族文化发生联系。在中国历史上,中国文化有输出也有输入,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过两次重大影响。汉代后传入的印度佛教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伦理、哲学、文学、艺术以及社会风俗的影响都极为深刻。对目录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佛经的大量翻译、整理和传播。“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直接产生了佛经目录学作为目录学的一大流派,也引起了人们对佛经著录的兴趣,佛经目录的不少方法如总经序等影响着其它类型的书目。据姚名达统计,历代佛经目录78种,但佛经在古代书目三体中并未占首要地位,这与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态度是相吻合的。明末清初传入的欧洲西学对中国文化也有过短时间的影响。利玛窦等约500名耶稣会传教士先后来华,不仅带来许多科学仪器和制品,而且在华著译出版了约120种科技著作,它改变了传统文献的类型与构成,成为我国新的书目文献源。直到清末形成译书事业,在西学输入中,翻译目

录出现,如英国傅兰雅所著《译书事略》中三种目录(1878年)、梁启超在《西书提要》基础上编《西学书目表》(1896年)等等。这些目录中的文献及其分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知识结构。

文化交流对目录学的影响主要表现于书目工作对象——图书文献的影响,而图书文献的发展又依赖于文字、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展。每一次技术革命,不仅给文化以深刻的影响,由此引起文献中知识、文字、记录材料、记录方式四个要素的变化;而且为目录学提供了变革的时机和条件,新的方法不断取代旧的方法。也正由于文化交流促使我国目录学不断借鉴外国的先进技术方法,如卡片目录、关键词索引和文摘技术,一方面改变了传统目录学的结构,另一方面又促进目录学的世界化和现代化。

文化是影响目录学的主要社会环境。因为中国文化直接与经济、政治相联系,从根本上说,时代与时代的区别在于社会经济与政治。这样,在目录学发展的文化观中还要注意经济、政治对目录学的影响。历代禁书与焚书虽是文化史上的现象,但总是政治与思想斗争的结果,它对目录学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图书“五厄论”、“十厄论”,影响书目收录文献的数量和范围;而且影响着书目的收录标准和评书标准。中国长期的封建政治、中央集权制导致官藏书目的发展:诏撰书目、政府组织、集中编目、御览钦定、寓禁于征等等。特别是目录学思想和目录学方法受到封建政治的束缚,书目提要大肆宣扬封建思想,为封建政治服务。

纵观中国古代目录学,民族特色也就是儒家哲学、封建政治及其学术文化的特色。社会心理与目录学家的思想、学术思想体系与目录学理论、文化成果与目录学著作、经济结构、社会制度与目录学方法等都发生着因果关系。既然目录学的社会环境以文化环境最为重要,那么,研究目录学史必须以文化史为依据。

过去研究目录学史,以姚名达整理最早、专论最深。他认为中国目录学史,时代之精神殆无特别之差异,深知中国目录学整体推进的特征。他不用断代法,并不是否定时代的意义。后人多用历史发展的顺序叙述目录学,分代不足以反映目录学的发展特征,只有分期才能展示目录学的阶段性。然而,迄今关于目录学史的分期众说不一。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将古典目录学分为三个阶段:周至三国、晋至隋、唐至清。汪国垣《目录学研究》分为唐以前、唐宋元明两个阶段。这两种划分都以唐为分界线,是因为《隋书经籍志》的地位。其实唐目录学承前启后更重,这两种划分比较简单,缺乏依据。所以王重民《普通目录学》根据目录学的重大著作,将古代目录学分为三个阶段:从远古到公元前1世纪末《七略》完成;从公元1世纪《七略》以后到第7世纪《隋书经籍志》;从第7世纪到1840年。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对唐以后再作细分,划分四个阶段:殷商至汉、魏至隋末、唐至元末、明至鸦片战争。这两种划分较多地结合了历史的变化,且唐以前划分大致相仿。以上四家,余、汪氏分期后同前不同,而王、吕氏划分前后不同。

我们认为,目录学的发展分期参考历史分期不如以文化史分期为根据更为科学。但是关于文化史的分期也很不统一,有三分、四分、五分甚至十分法,这些划分体现出一些重要文化特征:汉代是我国文化史上的第一里程碑,代表着儒学的统一,中国文化的定型;唐代文化是魏晋以来佛教发展的顶峰,代表着佛学时代;宋明文化儒佛混合、理学兴盛,是中国文化的强化期;清代文化,朴学发达,既是封建文化的总结,又是文化转型的开始。在我国文献学史上,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同始于汉、兴于宋、而盛于清。就目录学而言,汉有向、歆与《别录》《七略》,班固与《汉书艺文志》;宋有郑樵与《通志·校讎略》,清有《四库全书总目》、章学诚与《校讎通义》,都是中国目录学史上的大家与杰作。所以《目录学概论》和《古典目录学》二书把古典目录学分为春秋到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五个时期,是以文化史分期为依据的。

正象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一样,目录学的文化观要求我们正确认识古典目录学与现代目录学的联系。几年来目录学领域中肯定和否定古典目录学的两种倾向,都根源于文化学界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讨论。经过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从文化的角度看目录学要注意三个方面:首先,是如何对待传统目录学。按鲁迅对待文化遗产“占有、挑选”的态度^⑧,对传统目录学要进行科学地认识,区分精华与糟粕;对古典目录学的全部肯定或彻底否定,以及目录学全盘西化的思想都是极端片面和错误的。其次,是现代目录学如何批判地继承古典目录学。现代目录学是古典目录学的延续,有相契合的一面,它已汲取了古典目录学中揭示文献的方法和专家编目的优良传统。但是现代目录学要发展,又有与传统观念、传统方法相冲突的一面,它必须靠近现代化,靠近学科前沿,增强其生命力。再次,古典目录学在近代已经终结,而古典目录学研究还需要不断地发展,构成目录学史的组成部分。

目录学是关于文献的文化现象

目录学文化观的最高境界是对目录学本质的认识。透过古典目录学与现代目录学的两种文化观,特别是目录学嬗变中文化的作用,我们看到文化与目录学的外部联系。那么,这种联系有什么样的内在结构呢?

文化结构是对“文化”概念外延的认识,在物质的、制度的和心理的三个层面组成的文化结构中,文献属于前两个层次,从文献形式看属第一层面,但从文献内容看属第二层面。书目亦然,书目的形式是物质的,而书目的内容是制度的。实际上,书目是文献的一个特殊类型(二次文献),在形式上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内容不同,文献的内容是知识,而书目的内容是关于知识的知识。从这个角度看,目录学主要是制度的文化现象,表现为目录学文化的一个层面“书目——文献——知识”。

金克木运用符号学原理解说文化,说“社会文化现象中可以把物、事、书三样当作指示意义的符号……。书中的文字是符号,文字联贯成语言仍是符号,语言所说的事件还是符号,因为其中意义都是不可直接见闻的,是借文字语言而传达的”^⑨。按照这种观点,目录研究的客体是文献符号,可作为文化的一种符号系统。

章学诚说过“《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这一哲学思想产生了“六经皆史”“六经皆器”的新学术观点,深刻反映了学术思想(道)与文献(政典、掌故、器)的关系,“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⑩。用“道不离器”思想解释文化,可见物质与制度二个层面的辩证关系,也体现学术文化的地位。长期以来,我国目录学兼学术文化之史。白寿彝把古代学术史专著分为目录、传记、目录传记等混合三种形式。现代目录学虽不直接关系学术文化,但它以“器”传“道”,在文化结构中起着沟通的作用。因此,目录学是物质与制度相结合的文化,核心是符号 and 知识组成的书目信息系统。

社会心理是文化的实质性部分和最高层次。这一层次中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宗教观念直接影响着目录研究中的主体,并作用于客体。更重要的是由于群体是书目信息的潜在用户,他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等社会心理无不影响着书目情报意识、需求与行为。我们既要从心理学角度研究目录学中的心理现象,也要从文化学角度研究目录学中群体行为的根源和变化及与具体时代社会心理的关系,如古代目录工作中的整体观念、重义轻利观念,目录学家的经学态度、保守封闭心理与古典目录学的方法陈旧,以及现代目录学中信息观念与用户需要层次、开放观念与书目情报服务等。从主体的心理角度看,目录学是间接的心理文化现象,形

成目录学文化的另一个层面“书目情报服务——文献需求——知识需求”。

文化学中文化类型区别于不同社会群体或民族的文化。根据对文化结构的分析,目录学既是文化现象之一,不同民族的目录学应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我国传统文化的类型主要是伦理政治型,所以传统目录学性质是政治文化的目录学。这种目录学表现的许多特征与中国文化的特征相关。如重道轻器的特征决定着目录学重提要、重类例、重小序,轻著录、轻“簿录”;经世致用的特征决定着目录学多实践、多书目,少理论;崇古重老的特征决定着目录学多继承,少创新,重古本、善本、孤本,轻新本。过去人们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作为中国目录学的精神和优良传统,并未全面概括中国目录学。我们认为中国目录学的精神离不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特别是求是、务实的精神,无论是官藏、私藏与史学派、校勘派与版本派,还是理念派与考订派,都具有这一精神。从古代的“文献整理”到今天的“文献开发”,从古代的文化积累、辨章学术到今天的文化导读、科研指南,都是关于文献的文化现象。

总之,目录学文化研究关系到对古典目录学评价及其研究领域的深化,关系到现代目录学的开拓和发展方向,特别是关系到目录学存在的价值体系与本质的认识。通过以上的讨论,可以归纳以下问题:

1、文化是目录学研究的基础,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目录学,能够解释目录学领域中的矛盾现象,总结书目工作的运动规律。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与目录学理论、儒道佛对中国目录学的影响、社会心理与书目信息需求是重要的研究课题。因此,要把文化学作为目录学研究的方法论。

2、文化比较是目录学发展研究的手段。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比较直接影响着古典目录学与现代目录学的比较,由此产生的两种目录学文化观揭示出目录学发展的整体化、阶段性规律,在此基础上进行中外目录学文化环境比较是总结世界目录学规律的依据。

3、文化的发展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目录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这项工程中担负着整理和开发文献,进行书目信息交流的重要任务,是文献信息交流的中介。随着文化的现代化,现代目录学不断改革与创新,具有现代化意识的目录学家运用科学的方法和现代化手段揭示报导文献信息,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书目工作的自动化、书目服务的信息化、目录学理论的系统化是目录学现代化的标志。在现代化的文化背景下,目录学理论和实践将全面地发展。

注 释:

- ①⑤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本,第85、22页。
- ② 伯里:《热爱图书》,《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4页。
- ③ 谢拉:《图书馆学基本原理》,《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第302页。
- ④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版,第126页。
- ⑥ 鲁迅:《读书杂谈》,《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三卷 第441页。
- ⑦ 毋斐:《古今书录序》,《旧唐书》卷46,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六册 第1965页。
- ⑧ 张尔田:《校讎学纂微序》,张舜徽选编《文献学论著辑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 ⑨ 来新夏:《古典目录学》,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01页。
- ⑩ 鲁迅:《拿来主义》,《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卷 第39页。
- ⑪ 金克木:《文化的解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5页。
- ⑫ 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中》,中华书局《文史通义校注》1985年版,第477页。

(本文责任编辑 江 平)